

穿透暗夜的“东方预言”

——毛泽东发表《论持久战》

1938年，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。

以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揭开序幕的1938年，每一页日历上，都写满焦灼与迷茫。

4月，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以5万余人伤亡为代价，第一次迎来正面战场可被称为“大捷”的胜利。洋溢着乐观情绪的“速胜论”很快就和“大捷”二字一同占据了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。而仅仅1个月后，日本人的坦克就从厦门五通凤头登陆，一路堂而皇之地开进了厦门大学的操场。

5月19日，被“速胜论”者们称为“中日准决战”的徐州会战，最终以中国守军仓促撤离作为句号。当一辆辆日本装甲车沿着徐州最繁华的彭城路，以轰鸣声狂妄叫嚣时，“速胜论”便如午后阵雨般，惶然消失在燥热的初夏里。

中国版图，大半已破碎。

此时，上海法租界的“孤岛”上，来自各国的军事观察家与新闻记者纷纷化身“预言家”。他们列出了中日两国的钢产量比、军事力量比，以冰冷的数字“判断”出中国的败局；而南京西流湾8号的豪华花园洋房里，国民党内“低调俱乐部”的成员们，已在茶余饭后讨论起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战败。

中国，会亡吗？我们，有胜利的可能吗？怎么才能胜利？一连串问号，像一个个风中摇曳的火苗悬在万千中国人心头，扑朔迷离。

然而，早在两年前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陕北保安的简陋窑洞里，就已经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

1936年7月16日，刚刚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，语调平静地告诉斯诺：“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，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百万至二百万人口的区域，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。”

当时的斯诺，或许只是将其视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一种表述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，直到两年后，才终于向世界揭晓。



太行铁壁（中国画，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，中国美术馆藏）。

而撬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支点，是广泛而深入的游击战争—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，将成为消耗敌人、积蓄力量、最终实现战略反攻的关键伟力。

直到今天，许多人在读到《论持久战》时，仍不禁怀疑这篇文章的写作年份。还有人说，《论持久战》为“预言书”，而毛泽东是未卜先知的“预言家”。人们很难解释，在战局最扑朔迷离的时刻，远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，为何能如此准确地“预言”这场战争的每一阶段进程、形态和结果——或许，这些人并不明白，在历史的单行道上，人类只是徒步的旅人，可有些真理，却可以洞穿时间。

1938年7月，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最早的《论持久战》单行本，封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。扉页上，毛泽东用他独特的字体，写下了25个力透纸背的大字：“坚持抗战，坚持统一战线，坚持持久战，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。”

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，这束窑洞中的灯光，为在苦难中挣扎的国人，照亮了漫长却必然通往胜利的道路。

三

1938年6月12日，日军攻占安庆，取得进行武汉作战的前进基地。6月15日，日本正式决定进攻武汉。

战云密布之际，一本《论持久战》的小册子，悄然出现在汉口、重庆、桂林、西安的大街小巷。

此刻的武汉，各国记者目睹着不同寻常的景象：挑着饭锅的川军、扛着老式步枪的湘军、赤脚行军的桂军，100多万军民沿江布防，枕戈待旦；烟俊六与冈村宁次则率25万日军兵分南北，两路压境……此时，还没人预料到，日军精锐部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。

1938年11月3日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，宣布放弃“速战速决”的计划。

人们惊讶地发现，延安窑洞中传出的“预言”，已开始一一应验。

11月25日，湖南衡山召开“南岳军事会议”，国共双方300多位高级将领参加。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上详细阐述了《论持久战》的基本思想，并直言，这就是八路军在1年多里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原则。

李宗仁病退，暂代五战区总司令并指挥武汉会战的白崇禧坦诚地说：“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问世后，本人已经多次拜读，并已向委员长作了诚挚推荐。”

实际上，这一战略精髓已被融入武汉会战的部署中：依托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节节抗击，“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”，拉长战线，消耗敌人。

很快，《论持久战》便同蒋介石的讲话一起发到各高级将领手中，包括没有来参会的人，人手一册。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、北路军司令傅作义，则早已把这篇文章印发到部队。冯玉祥更是自掏

腰包印制了3000余册，作为礼物分赠给国民党要员。

担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余致浚清楚记得，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，他受邀去蒋经国家里喝咖啡，看见蒋经国从书架上取出一本《论持久战》的单行本，“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，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、圈圈，密密麻麻，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”。

不光军事将领，大众对《论持久战》也充满了热情。到1938年12月，这本小册子已是“现象级作品”。散文家吴伯箫回忆，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与《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》，石印5000册，“不到半月工夫，几乎连该社存的一本底子都有人想买了”。

《论持久战》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。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，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，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。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，为英文本写了序言。在海外，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。

海的另一边，日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。1938年9月初，与《中央公论》《文艺春秋》和《日本评论》并称日本四大综合类杂志的《改造》，全文登出由鲁迅的学生增田涉所翻译的《论持久战》全文。1939年3月，日本汉口军特务部编辑的秘密情报《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》中，再次详细阐述了主要观点。对此，日本军政要员虽然没有给出正面评价，却默默在军事部署上进行了调整。

然而，日本人依然无力回天。“明知而不可破”，是因为《论持久战》从来不是“阴谋”而是“阳谋”，不是“战法”而是“真理”。让中国人最终赢得胜利的，是人民战争的伟力和正义必胜的历史逻辑。

在那些硝烟弥漫的岁月里，一个共产党员，哪怕只是一个通信员、一个卫生员，就能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；哪怕一个排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战士，就能开辟出一块新的根据地。

为了胜利，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，放下锄头，攥紧简陋的刀枪；为了胜利，白发苍苍的母亲将孩子送进硝烟，妇女们就着昏黄油灯，细细密密地赶制战士的冬衣……平静的芦苇荡下，埋伏着复仇的枪口；广袤的平原深处，暗藏着一张张村村相通的巨网；地雷在敌寇脚下开花，麻雀战在四面八方袭扰，破袭战让敌人的交通动脉寸断……《论持久战》中的字字句句，化作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个奇迹。

1945年9月2日，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。美国的一家报纸评论说：“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毛泽东一直是正确的。”

美国人不知道的是，历史的轨迹，在1938年那个交织着绝望与希望、溃败与觉醒、黑暗与光明的年份，已被延安窑洞中闪耀的思想星火，不可逆转地扭向了胜利的方向。

解放军报

刘云彪：屡建战功的骑兵团长

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濯田镇露潭村内，坐落着一座青砖黛瓦的客家古民居，墙上的红色标语仍清晰可见。这里是我军骑兵部队的早期创建者之一、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团长沙刘云彪烈士故居。

刘云彪出生于露潭村一个农民家庭，父母以撑船、务农为生。1931年，刘云彪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红12军36师108团侦察排排长等职务。

长征开始后，刘云彪因表现出色，担任师侦察连连长。1935年9月至1936年中，刘云彪先后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副连长、骑兵侦察连连长等职务。其间，他在作战中屡立战功。

1936年，红军在保安县（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）成立红一方面军第一骑兵团，刘云彪任团长。1937年2月，刘云彪参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习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骑兵团改为115师骑兵营，刘云彪任营长。

兵强马壮纵横驰骋，龙岩市史志部门为纪念抗战胜利史迹展收集的多张抗战老照片，展示了刘云彪烈士生前的飒爽英姿和骑兵部队的雄壮。刘云彪于1937年9月随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，随后率部参与了平型关战役。为确保平型关战役侧翼安全、聚歼日寇，刘云彪率部占领地势险峻的倒马关。

“倒马关之战，刘云彪率部摸黑在山区羊肠小道中急行军16小时到达指定位置，并与提前到达附近的日军展开了遭遇战。”闽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蒋红婴说。刘云彪指挥部队夺下日军碉堡，并向靠近倒马关的日军展开猛烈攻击，击毙其指挥官。此战，刘云彪的骑兵营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。至天黑，他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总攻，迫使日军败退撤离。

1937年10月，刘云彪又先后率部攻克曲阳、唐县等地，消灭大批伪军，开辟了北岳区抗日根据地。1938年，为配合徐州、武汉等地会战，刘云彪率部向津浦线出击，多次与日军展开激战。同年10月，刘云彪率部日夜兼程300多公里，在反“扫荡”中对在晋察冀地区的日军高门镇指挥部实施了“斩首行动”，成功打掉了日军指挥部。

1940年初，刘云彪的骑兵营改编为晋察冀军区三分区骑兵团。同年8月，他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，转战于河北省唐县、完县（今顺平县）、望都一带。是年冬，在反“扫荡”中，他率部发动群众破坏公路铁路30余次，激战14次，使日寇闻风丧胆。

长期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让刘云彪感染了肺病，他多次婉拒休整治疗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期。1942年4月12日，刘云彪病逝于河北晓峰县，年仅29岁。同年6月，晋察冀边区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将晓峰县更名为云彪县。1953年烈士遗骨迁葬至华北军区烈士陵园。

刘云彪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成为故乡永远的骄傲。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王英说，近年来，政府还将露潭村列为红色教育基地，把刘云彪烈士故居修复等纳入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建设项目。

人民日报



刘云彪

